

不容「秘史」盡成灰

田中奏摺揭密實錄

(三)

●王成聖 (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蔡智堪撰文予駁斥

二次大戰結束後，蔡智堪回到台灣居住，出於民族大義，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廿八日的香港「自由人」刊物上，發表了「我怎樣取得田中奏章」的文章。蔡智堪在文中指出以賣木炭出身，素志武力吞併我國的日本田中義一大將，是長州軍閥最後的巨魁。幼年家貧，買賣木炭為生。稍長，在元老山縣有朋家執茶房役，受業樺山老將，讀破曾文正公全集和大清一統志，成為日本軍閥裡第一個「中國通」。他繼承山縣大將和福島大將的衣鉢，以吞併我國為素志。

當民國十六年時，田中任政友會總裁。時日本有兩大政黨，一即政友會，一為

民政黨。

政友會組閣，田中任首相，眼見本黨北伐，主張強占東北。六月廿七日，田中內閣召集「東方會議」，至七月七日止，先後集會十天。凡日本派駐我東北、北平、天津、上海、漢口等使領，駐蒙古的特務人員、關東軍長官、南滿鐵道總裁等，都齊集東京，密議占領東北後，在政治經濟方面如何施設；大要為對抗中國國民黨，在東北組織「協和會」，懷柔國民黨的要員；強擄張學良，黃袍加身，讓他稱帝或稱「滿洲國大總統」等等。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至八月十六日，田中又召集駐我東北的外交和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研究「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大連會議後某一天（約為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

日），田中將兩次會議的結果，即所謂田中奏章，上奏天皇，並向世界宣言說：「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內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各國爭欲取得密奏，美國開價廿五萬美元，世界各國對這晴天霹靂的最後宣言，頗為震驚，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我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派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當地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天皇，決心用武力吞併東北。世人對於田中

(三) 田中奏摺揭實錄

密奏內容如何？又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某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云云。

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博士對於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取蘇俄買去之件，聞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五萬美元，勢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田中密奏截至蔡智堪抄出之前（民國十七年六月間）並沒有落入英、美、俄任何人的手中。王家楨寄來郵包大餅一枚傳來密信。

民國十七年六月的一個星期天，正值蔡智堪宴請中野正剛、出云代義士和金森貴族議員，在東京私寓的三樓大飲「五加皮」。下女送上瀋陽寄來小包郵件一件，打開一看，乃係大餅（點心）一枚，中野正剛說：「中國大餅轉贈與我如何？」蔡智堪答以：「餅非煎過，食之有害。」散席後，剖餅視之，得王家楨手書，（水筆寫成，置於餅內）云：「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人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

樹人乃王家楨之大號。在此先稍稍說明蔡智堪和王家楨的關係，蔡智堪自清末親奉總理孫中山指示，在日本辦理國民外

交。十三年蔡智堪和李烈鈞合作，迎接總理赴大阪，完成某項外交工作。以後李烈鈞囑蔡智堪多多為「滿蒙問題」盡力。張作霖被日本炸死後，蔡智堪向王家楨（時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主持東北對日外交）提供炸彈破片。多年以來，經常把所知日本內幕政情，純義務地供給張學良將軍，都由王家楨經手。王家楨每到東京，都下榻蔡智堪經營的蔡丰源行內。

利用外交取得密件

接到餅信之後，蔡智堪很是驚愧。他雖然知道田中決定武力吞併東北，但並未注意外面所傳田中秘密奏章上給天皇。這是日本最高機密，絕對不容易拿到的。萬一事敗，在日本法律立場（蔡氏係日本臣民，時台灣已歸日據），蔡智堪非犧牲性命不可。經過仔細考慮，蔡智堪認定不可使用「間諜手段」，因為這不單性命危險，萬無一成，而且空費金錢；必須運用國民政黨，利用民政黨和政友會的矛盾，使民政黨拿出政友會（田中）的秘密文件來。辦法決定後，蔡智堪以私人身分分別宴請前內務大臣屬於民政黨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內閣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

都是蔡氏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錢上頗有往來。原來日本改革首領都是很窮的，對外又不能不講排場，開銷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下文將要談到的內大臣牧野伸顯伯爵等人，都有鴉片煙和五加皮酒的嗜好，這是中國式玩意，只有蔡氏能源源供給，所以大家相處得很好。此嗜好皆由近衛及犬養老傳授的。

政界矛盾完成任務

蔡智堪先向永井提議，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他主持的「日華」雜誌上發表，藉以「發動輿論，一心向滿蒙躍進。」永井立即謝絕。蔡氏又要求床次，為了民政黨要打倒政友會，應該揭發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領滿蒙政策，必將招致中日絕交，兩敗俱傷。床次向蔡氏說：「田中奏章對滿蒙雖然利害，無如國民輿論不容許？你如果必要，我當為你打聽線索。」不出數日，床次又來向蔡智堪說：「保皇黨（皇道派）元老級認為田中武力吞併滿蒙政策，終將激起軍人革命，危及天皇萬世一系，正急於破壞田中的政策。但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田中，必要引起少壯軍人革命。元老中現正在進退兩難階段。我可利用

這個機會以謀取田中奏章，豈有成功的可能性。請你準備高等中國菜和五加皮酒，作為宴請元老之用。」蔡智堪即約請梅蘭芳的舊廚師崔某，給以五千日金，預備最上等菜，在床次邸內開席。席上床次致詞說：「田中武力吞併滿蒙，終必惹起國內革命，危及天皇。」蔡智堪也發表演說和床次呼應，以敷衍之。

六、七日後，床次來向蔡智堪說：「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敢將田中奏章公表國際，保皇黨方可利用英、美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政策。中國如能承允這一點，牧野密許你去抄寫。」蔡智堪接到床次傳達來的牧野所提條件後，立即利用東京每夕新聞紙，選點要字，把這條件秘密函告王家楨。又過四、五日，王家楨以「王川」名義電匯五千元來，並有一電文說：「病床費五千元奉返（按此指床次宴客費）。其病如要至歐美醫治者，余擔保負責。」其餘是答覆牧野所提的條件。蔡智堪和床次持電往謁牧野伯爵。伯爵見電大喜，拍髀言曰：「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長了。」當即命令其妻弟山下勇，約妥日皇室書庫官，布置蔡智堪夜間入內，抄取田中奏章。偷渡斷足橋涉入日

禁宮，日本皇宮有大門二十四，偏門三十六，皇警多名，穿長衫，持長刀，日夜守望。各門前設有長橋，日本人稱它為「斷足橋」，如有人潛渡門橋，皇警必揮長刀，砍斷其足，然後再處以不敬之罪（死刑）。

民國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個夜間，十一點五十分鐘，蔡智堪攜帶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片大小型三、四十張，綠色繡線數圓，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個補冊工人，攜帶牧野伯爵交來的金盾圓形的「皇居臨時通行牌」（號碼七十二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皇城。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營，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後來決定由「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斷足橋」很長，四面樹木不足遮掩。從「紅葉山下御門」入門後，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鐘。蔡智堪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時五十分。田中奏章採用日本內外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製而成，共六、七十張，標簽「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將炭酸紙裝鋪原件中，用鉛筆以描寫。所用炭酸紙係民政黨總裁專用的薄質原紙。費時兩夜，細心抄寫。

私宅被占幸逃法網

蔡氏抄出田中奏章後，歡天喜地，致電王家楨說：「我務既果，明去陪罪。」蔡氏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夾底裡面，親往瀋陽。到小西關外王公館，交王家楨手收，王家楨大喜，無暇招待他，立即親送給張學良將軍，回來方為蔡氏洗塵。次日王家楨便去南京，蔡智堪也返回東京。二十八宿歸天兩百萬美元沒收以後，田中奏章成國際聯盟座上中、日代表舌戰的大問題。日本代表松岡洋右指陳田中奏章係由我國偽造，我代表竟也洩漏田中奏章係由皇室書庫抄出。松岡代表電之日本政府追究責任，結果皇室書庫官山下勇等全體二十七、八人一律免官，當時日本報紙大字標題云：「蔣介石駐日二十八宿歸天」！蔡智堪當時幸逃法網。但山下勇等免官以後，生活費二萬五千日元由蔡智堪私人拿出，不久又強行占去蔡氏的私宅，至今仍然未能索回，遷延許久，蔡氏也入獄，在日本的全部產業約值二百萬美元也被沒收。重述這段歷史，不勝感慨之至！

田中奏章是日本軍閥斷送日本，斷送自身，也斷送中國的瘋狂政策的結晶；若

不是蔣中正總統極力主張戰後保持日本天皇制度，這一文件也便斷送了天皇。

牧野和床次先見及此。藉我國之手洩之於外，原為打倒田中政策。從一切斷送之後的今天看來，牧野和床次應該是見諒於日本君民的。蔡智堪為此事件遭受的產業犧牲，固然很大，和牧野、床次名聲犧牲似乎不同。牧野、床次因安定天皇，不惜洩漏機密！蔡智堪則是為了中日和平共存共榮才從事國民外交，日本朋友應知道，蔡氏不是「間諜」，而是一個九分愛中國之國民卻也一分愛日本的人。但他們卻連十分之一的產業也沒有給蔡智堪留下。

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六十八歲的蔡智堪在台北病逝前，仍不忘向親友講述自己從日本皇宮獲取日本侵華機密的經歷，駁斥日本當局否認「田中奏摺」的言論。

田中奏摺譯本來歷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王家楨在「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中，發表了題為「日本兩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敘述了「田中奏摺」的背景及翻譯、公布的經過：「這年年尾前後，我們的駐東京辦事人蔡

智堪（日籍台灣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國觀念很強），分批給我寄來一些文件。另外來信說，這是絕對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裡當書記抄寫來的，只能分批寄來。原來這個文件，就是由政友會新選出來的總裁田中義一大將在大連召開的東方會議的一部分會議秘密記錄，經整理後以奏摺形式呈奏日本天皇的，我就給它取名為『田中奏摺』。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的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因為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錯字錯句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而且語氣誇張。……但是後來才逐漸覺察到，這個文件不是個尋常的偽製品，因為內容所提的好些具體事實，以及為了推行它的侵略政策所採取的措施，都是合乎邏輯的發展，特別是關於滿蒙的經濟開發，全是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加以闡述的；對於某某蒙古王爺的密契也全是事實。我這才將寄來的稿件交給辦公室分段先行譯出，然後再將意義不明瞭或是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這次我將原稿面呈張學良，說明了它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就請他當時批准了。因為是機密文件，特在官銀錢號印刷所

印刷，用上等宣紙六開大本裝訂，共只印二〇〇本，發給在東北範圍內簡任級有實職的人員每人一本，送給南京國民政府四本（當時共發出一二〇本，其餘存在我家）。

真相大白日人恐慌

蔡智堪、王家楨兩位重要當事人文章的發表引起各國的廣泛關注，「田中奏摺」的真相至此大白於天下！

日本當局大為恐慌，下令發動龐大宣傳機構，抓住蔡智堪、王家楨文章中的某些細節差異，極力否認「田中奏摺」的真實性。日本學者江口圭一、橋川文三於一九六五年分別在「人物往來」、「中國」等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日本各派對「田中奏摺」的觀點，分析「田中奏摺」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

「田中奏摺」中譯本的組織者王家楨生前對此問題極為重視，從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曾五次與研究「田中奏摺」的學者高殿芳談此問題；王家楨說：「由於我與『田中奏摺』結下不解之緣，所以我很關心它，也有責任盡我所能給予協助。國內外的文章，我都閱讀，訪問我的人也不少。談的還是一些老問題：真假

(三) 田中奏摺揭實錄

問題、呈奏方式、非田中手跡等等。」

「我知道的有關『田中奏摺』的基本事實都寫在『兩個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那篇文章裡，對這個歷史事實不能輕易地無根據地否定，『田中奏摺』是確實實存在的，既不是臆說也不是偽造。公布以後引起國人和世界輿論如此強烈反響，對日本當局震動如此之大，對日本侵略者打擊如此之重，更是我所沒有預料到的。『田中奏摺』公布於世，確確實實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也確確實實博得了全世界輿論對我國的深切同情。日本的一些當權人物極力否認它，還硬說是中國人偽造，是我王家楨偽造，真是豈有此理！這是日本人慣用的手法，是欲蓋彌彰！」

王家楨說到這裡非常氣憤，然後又很有遠見地說：「我們中國人研究它的目的是設法解釋它存在的矛盾，發現新材料，去科學地論證它。研究這個問題不能捨本求末。要看日本對我國進行侵略的史實。他們進行侵略的實際步驟，完全與『田中奏摺』的主張相吻合。再說『田中奏摺』是一個未公布的絕密文件，侵略意圖很露骨，如果不是蔡智堪秘密抄到手，中國不予公布，日本是絕不會公布於世的。我國

公布以後，中日兩國嘩然，全世界嘩然。日本統治當局矢口否認，這是自然的！」

時至今日，仍未發現「田中奏摺」的原件，中外學者對此一般有兩種看法：一是毀於戰火。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至十日，五月廿四至廿五日，美軍對東京發動兩次大規模空襲，共出動B-29轟炸機一三二八架次，投下五、六千噸燃燒彈，在東京引起衝天大火，皇宮作為重要轟炸目標也燒起大火，滅火時被燒死五十餘人，文書典章損失無數。「田中奏摺」原件很可能便毀於兩次大火之中！

二是日本統治當局為銷滅滅證秘密燒毀。蘇聯學者A·H斯米爾諾夫、E·B·扎伊采夫在所著「東京審判」一書中，對此有如下看法：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同意無條件投降，但直到八月卅日美國第一批空降部隊才開始在東京著陸。在這十六天內，東京保全下來的政府大廈頂上濃煙滾滾，這是在燒毀無數的、各種各樣的絕密文件，因為那些文件能暴露日本帝國首腦們破壞和平、違反人道、踐踏進行戰爭的法規和慣例的滔天罪行。

不僅首都銷毀秘密文件，而且外地，凡是有日本陸海空軍兵團與部隊司令部、地方都在銷毀文件。各戰俘營、監獄、省

府、警察廳、憲兵廳都把文件燒毀了。因此，被告人和證人自然就是異口同聲地斷言政府根本沒指示過要銷毀國際軍事法庭需要的文件。

但這只是托詞，目的是為被告人開脫對這一事實應負的責任。極端中央集權化和官僚化的日本政府機關（第二次大戰時尤甚）一向等待上邊指示，下邊從來沒有主動性，在對待銷毀事關國家且屬絕密的文件這類重要問題上，尤其如此。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為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